

#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刘书文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摘要:**新时代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了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就,经受住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风险。党的意识形态治理是由意识形态制度和治理体系、意识形态治理能力与意识形态治理效能共同构成,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从“中国之制”走向“中国之治”的驱动机制。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制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嵌入性”融合,建构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新话语。党的意识形态治理需要在党的意识形态制度和治理体系、意识形态治理能力和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构成的文化逻辑整体中实现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构筑起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向心力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治背景下,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科学意涵及其内在逻辑,不仅对于筑牢党和人民的思想防线和文化长城影响深远,也对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学”学术话语和丰富党的建设学科方向意义重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学术话语;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1-0033-07

##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 问题提出与话语解读

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表明,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始终发挥着“生命线”作用,意识形态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大提出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sup>[1]29</sup>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置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作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sup>[2]23</sup>的重大制度创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制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首次“话语”融合。党的二十大在总结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改变”<sup>[3]</sup>的基础上

再次强调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认识维度上来讲,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是“用来支撑我们的‘现实’的幻象建构”并为我们构造“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sup>[4]64</sup>。拉康认为“无意识是大写他者的话语”,是“像一门语言那样被结构化”。事实上,作为一种结构而言,意识形态与“无意识”中的“意识”仿佛并无关联。但在阿尔都塞看来,即便是意识形态的运作也并非必须经过意识而进行。他指出:“意识形态表征着个体与其现实存在条件的想象关系。”<sup>[5]296</sup>这便为解决意识形态的表征和表达问题开拓了思想空间。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话语”和“意识形态”争鸣互动中开始出现一种现代性、外显性的“中国话语”建构倾向,以破解“中国道路”在人类现代性文明谱系中面临的“失语

收稿日期:2023-03-28

基金项目:2023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和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中国共产党探索和推进共同富裕的历程和经验研究”(KYCX23\_3197)

作者简介:刘书文(1997-),女,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E-mail:836731353@qq.com

危机”<sup>[6]23-29</sup>。需要注意的是,伴随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所建构的居于强势主导地位和外显性的“中国话语”却也可能潜藏着弱化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危险。如何在建构阐释中国道路、中国奇迹和中国方案的“中国话语”与练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功”之间寻找最佳结合<sup>[7]170-176</sup>,是当下中国共产党亟需面对的重要工作。中国的事情要办好,中国共产党的事情首先要办好,这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sup>[8]380</sup>。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决定的,是由“中国共产党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圈层治理权力结构的中心”<sup>[9]100</sup>地位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牢意识形态工作、筑牢我国的思想防线和文化长城,至关重要。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3]</sup>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意识形态治理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治理,党的意识形态治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求。治理所求的终归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sup>[10]23-32</sup>。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是一个整体性政治范畴。从内涵来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不是单一对应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治理,它内在包含了党和国家各族人民的意识形态整体治理,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党性与人民性、民族性和人类性的辩证统一。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是一个与党自身、与人民、与国家、与人类有着紧密关联的整体性范畴。从外延来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具有丰富内容,又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

领域,意识形态治理是超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内容边界的治理。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宏大逻辑叙事中解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内在逻辑,便成为新时代建设“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学”学术话语及学科方向的认识论前提,对于拓展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内容含量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 二、逻辑始项: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制度体系

理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逻辑始项,需要首先回答制度的根本内涵问题。制度是由一系列社会博弈规则或规范构成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sup>[11]226</sup>,对于各类行为主体、群团组织或政党无不具有强制性、激励性或引导性规范和指导功能。从十九大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来看,现实可以证明,探索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中国之制”是成为创造经济增长和社会持续稳定两大奇迹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中国之治”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sup>[3]</sup>深刻点明了当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复杂背景与严峻挑战。对于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完善的制度体系是促进国家稳步治理的有效手段和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使其由革命力量转化为国家执政者,这一身份的转变需要其承担相应的具体政治责任。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发挥其作为“软”的一手的统治功能<sup>[12]189</sup>。无论是在“中国之制”谱系还是在“中国之治”实践中,党的意识形态治理都具有基础性作用。

### 1.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sup>[3]</sup>这一根本制度必须围绕党的领导所展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执政党,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同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坚持马克思主义价

价值观为主导价值观,来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sup>[13]272</sup>。作为思想的上层建筑,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完善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廓清党内外文化思想的不正之风,发挥好“最大优势”和制度优越性,这不仅是走好意识形态大局的第一步,更是党的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前提。制度稳,则国家稳。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内部社会成员以及各组织的有序良好发展,必须要形成并且不断完善制度体系的建设,因此制度是起长远性、基础性作用的。从现实来看,意识形态也往往与现存的制度相互映衬,或为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或为其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有着明确的制度指向。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构建党的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的必要条件。

## 2. 健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制度

马克思指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sup>[14]655</sup>因此社会制度必须随时代发展而进行相应的变革,这种变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国家制度本质上则正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刚性表现。所谓基本制度,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此二者分别是基本制度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其中基本政治制度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基本经济制度则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及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所构成。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所建立起的基本制度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党内外合作建设和民族统一建设的重要成果积淀,更是彰显我国国体和政体的人民性的表现;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延伸,也是其在国家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制度是以共产党为内核的人民群众的意志体系凝结,但这并不是贬低意识形态的功能或理想信念的作用,这些

基本制度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治理发展发挥着重大影响。国家发展的远景目标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也是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

## 3. 健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制度

所谓“重要制度”,就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存在于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这些重要制度上接国家治理之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之基层。从结构上来看,重要制度从属于根本制度的框架之下,在基本制度的基础之上,涉及范围更广。重要制度并非纯粹的一般性制度,而是对巩固根本制度和维护基本制度起着遵守、执行和发展作用的制度。2019年中共中央所宣传引发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较为清晰和完整地讲述了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和党中央宣传工作方面的具体要求。因此,在考虑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逻辑前提之时,就应重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制度,发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建设的强大力量,进一步使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有效转化,从而促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 三、逻辑中项: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驱动能力

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不管国家本身采用何种政治体制或制度框架,构建起完整系统的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都有助于提升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驱动能力。驱动能力主要反映在治理主体的领导能力、管理能力和话语能力的提升上。厘清驱动能力与意识形态治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找到“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的治理过程中的话语短板,以逻辑严密、结构规整的治理体系助力提升意识形态治理能力,并以此规避意识形态的“退场”危险。

### 1. 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领导能力

从意识形态治理的领导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治理需要强大的领导能力。现代国

家治理包含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而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正是实现意识形态治理的主要方式<sup>[15]4-10</sup>。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sup>[3]</sup>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全党动手,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sup>[3]</sup>,必须落实到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指导能力和工作水平,确保领导能力集中统一于党的手中,保证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把握在党和人民手里。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的政治自觉,提升抵御逆历史潮流的社会思潮侵袭,系统规划好意识形态治理的顶层设计工作;其次,统筹兼顾处理好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各级领导充分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深入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最后,从人民群众角度出发站稳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民立场,在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同时牢牢将人民性作为党进行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意识形态治理要以中国共产党为意识形态治理的领导力量,通过培育主流价值观等途径增强人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抓住互动性更强的传播形式和网络空间平台,促进和全面提升党的意识形态治理的领导能力。

## 2. 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管理能力

提升党的意识形态管理能力就要增强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权能,巩固阵地意识,要在面对大是大非时,时刻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在宣传思想阵地存在的“灰色地带”,更要大规模展开意识形态工作,加快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sup>[16]28</sup>。鉴于此,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加强对媒体的引导和监管,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防止出现负面言论和虚假信息传播;加强意识形态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素质,增强他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敏感性和判断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制度和机制,

规范工作内容和方法,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强化网络管理,通过网络管理和技术手段,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监控和管理,及时发现和处理不良信息和攻击行为,维护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党管理意识形态的能力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sup>[17]335</sup>。在现实社会中,党必须不断坚持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完善各级党委和管理部门的相关制度措施,尤其是教育部门和思想宣传部门,要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决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增强政治意识和政治敏锐性。

## 3. 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话语能力

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话语能力,要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导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矢志不移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将强化互联网思想理论引导作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重要方向。基于对国内外形势、时代特征和民族特性的深刻理解,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设,努力在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过程中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基础。同时,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创新、形式转化及语境重构。结合时代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概念和术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展现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并反映中华民族的道德追求,进而打造能够在古为今用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断在实践中增强话语能力。

## 四、逻辑终项:全面发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综合效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sup>[3]</sup>,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对党和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治理效能。对此,必须要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展现出磅礴的中国共产党治理效

能和政治效应。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话语和符号权力的运作目标指向在于实现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地位。总体看,发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综合效能是要发挥其对巩固执政党治理的内核效应、动力效应及建构效应。

### 1. 发挥党的意识形态治理对“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的内核效应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需要全面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的内核效应。从思想上建党,就是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精髓和灵魂,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贯穿于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当中,确保思想纯洁和党性明朗,确保政治方向正确、政治立场鲜明;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sup>[18]45</sup>要实现党的建设与强大,就必须加强理论学习,理论只要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从理论上强党,就是要求全党从掌握方法论出发,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把握,并能合理科学地将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实践,在实践中获取新的经验上升为新的理论以丰富党的理论基础,实现全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步调一致,从战略高度积极重视和掌握“批判的武器”,提高党内干部和党员运用理论指导工作的能力,坚定共产党人的信仰理念,增强自身责任感和使命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战略高度将“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相结合,实现由思想归纳到理论总结、由理论凝结到思想升华的双向联动。

### 2. 发挥党的意识形态治理对“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动力效应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需要全面总结和发扬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充分发挥“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动力效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集体夙愿,而强国建设则是实现这一夙愿应有的内涵与目标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sup>[19]82</sup>这不仅是

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推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需要全党全面提高执行力,全面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同时与强国、建国、兴国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调一致。党的意识形态治理应当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培养,引导社会形成广泛共识,通过正面引导,凝聚全社会的价值观念,形成对“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认同和支持,这不仅是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内容,更是党进行意识形态治理的动力来源,充分发挥二者的联动效应有助于将“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动力效应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原动力,对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与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理论创新有重要意义。

### 3. 发挥党的意识形态治理对“中国话语”和“人类文明”的建构效应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需要全面拓宽治理视野,在现有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探索构建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为全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充分发挥对“中国话语”和“人类文明”的建构效应。语言是存在之家<sup>[20]366</sup>。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是党的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话语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中国话语的言说对象是“中国样本”,中国故事、中国奇迹构成中国话语最深刻的基础、最充足的根据<sup>[21]159</sup>。只有以“中国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解释“中国问题”、传递“中华文明”,才能建立起深厚的说服力来回应质疑与批判,让中国理论与中国话语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sup>[3]</sup>,更指出要不断“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sup>[3]</sup>。“中国话语”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在激烈的话语权争夺战中利用“中国话语”进行回应和反驳,才有可能在隐藏于话语权之后的国家利益纷争中立足于不败之地,真正有效地捍卫我国利益。充分发挥对“中国话语”和“人类文明”的建构效应就是要处理好中国特色与人类文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把握好中国话语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联动性,使新时代中

国在国际社会与自我目标的价值追求与实现过程中创新话语体系的建设,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并赢得更为广泛的价值拥护。在文明发展历史中不断构建逻辑严密的中国话语、完善和创新我国话语体系、从话语角度全面提升党的意识形态治理水平,推动人类对于文明进步的伟大理想,为现代化社会建设和发展增添中国力量。

## 五、余 论

当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党的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根本目标和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治理制度,无治理能力,那么制度就徒有虚名;有治理制度,无治理能力,那么能力就会被泛用滥用;有治理能力,无治理效能,那么效能就无法真正得以转化。以“体系—能力—效能”为整体向导,逐步完善意识形态领域制度和治理体系,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发挥治理效能,层层递进、协同推动意识形态建设。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蕴涵着清晰明确的内在逻辑,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改变的深刻背景下,厘清党的意识形态治理内容、治理过程、治理方法等构成的结构逻辑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是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方法论基础。因此,梳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内在结构逻辑便成为新时代建设“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学”学术话语的认识论前提,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2]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17(02).

- [4] 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 [5] LOUIS ALTHUSSER. Sur la Reproduction[M]. Pari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1.
- [6] 陈曙光. 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J]. 教学与研究, 2015(10): 23-30.
- [7] 韩庆祥. “意识形态建设内功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话语[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9(1): 170-176.
-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 [9] 翟坤周, 黎万和. 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结构及路径[J]. 党政研究, 2017(5): 94-101.
- [10] 格里·斯托克. 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 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 1999(1): 19-30.
- [11] 道格拉斯·C·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刘瑞华, 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
- [12] 余一凡. 从马克思到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13] 罗国杰.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15] 胡鞍钢.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征与方向[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3): 4-10.
- [16] 朱继东.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 [17] 王永贵.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 [20] 海德格尔. 路标[M]. 孙周兴,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 [21] 李海青.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与创新机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下转第45页)

## Digital Twin Villages: a New Paradigm for All-factor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FENG Xiao-gang<sup>1</sup>, SONG Kun-lun<sup>2</sup>, MA Qi-yun<sup>3</sup>, LI Meng<sup>1</sup>, ZHOU Zai-hui<sup>1</sup>, LI Feng-xia<sup>1</sup>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2.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35, China; 3.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ureau, Huang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81130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s constantly eroded by industr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leads to its ceaseless disappear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tect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an all-round wa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technology of digital twins about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the system framework, the construction path and so on based on the all-factor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ll-factor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win villages is a complex and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needs to be studied further from four dimensions: top-level design, standard system, constructing path and demonstration application. The new mapping-coupled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provides a data and technical basis for the all-factor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ope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ctu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and the two-stage system division for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that integrates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also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digital twins; all-factor;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paradigm

【编辑 高婉炯】

(上接第38页)

## The Intrinsic Logic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Ideologic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LIU Shu-wen

(School of Marxism,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start of the new er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to promote a series of transformative practices, made a series of landmark achievements, and withstood various risk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The ideological governance of the CPC is composed of both ideologic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system, and ideological governance capability and ideologic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which epitomiz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PC from "China's system" to "China's governance"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Putting forwar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ssue of ideology security,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has mutually embedded the Party's ideological work, the ideological system and ideological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ed a new discourse of "ideology govern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garding the cultural logic of both ideologic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system, and ideological governance capability and ideologic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arty's ideological governance to enforce the Party's leadership, management and discourse power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nd construct the spirit, values and strength of China that has the power to unite, lead and inspire people. Therefore in the macro governance context of promoting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scientific implication and its internal logic has not only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ideological defense of the Party and people and a Great Wall of culture, but also the most signal for constructing academic discourse of "the study of the CPC's ideol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ar" and enriching discipline direction of the Party's building.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deology; academic discourse;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编辑 吴晓利】